

# 文明冲突,抑或社会矛盾

## ——略论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与当地族群的关系

庄国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地相继发生各种族群冲突和排华事件。引发排华的最主要原因,是华人与土著民的经济地位差距。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对族群关系发生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引发族群冲突的因素日益消融,华族与当地土著社会的关系逐渐改善,东南亚族群关系基本上呈和睦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东南亚; 华人类群; 排华

**中图分类号:** K33;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 - 0460(2003)03 - 0070 - 08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排华暴行,其实,这只是战后东南亚一系列排华事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次,战后东南亚各国都出现族群冲突导致的不同程度的排华事件。尽管二战以后,东南亚华人已完成政治认同的转向,作为当地族群之一效忠于当地国家,且在血缘、种族方面也与当地主体族群日益趋同,但“华人”身份似乎一直是一种“原罪”,每当社会冲突激化时,华人就被当作替罪羊。亨廷顿将文明差异作为解释全球各地政治冲突的根源,并预言文明断层线的冲突是无休止的。[1](P283 - 284)华人与东南亚土著民的文明差异将导致无休止的冲突吗? 难道不同文化的族群就难以在一个国家和谐共处? 本文拟分析战后东南亚排华的各种原因,探讨东南亚华族与当地族群关系发展的前景。

### 一、战后东南亚的排华事件

如从明代初年算起,较大规模的华人社区出现在东南亚已超过600年。东南亚发生大规模排华暴行,则发生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在17-18世纪,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政府曾五次屠杀华人,1740年,荷兰殖民政府将巴达维亚万余华人屠杀殆尽。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民族国家先后建立,除新加坡政府以外,各国政府均推行程度不同的同化华人的政策。激烈的同

收稿日期:2003 - 01 - 21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资助项目(2000ZDXMGTW)

作者简介:庄国土(1952 - ),男,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化政策有强迫入籍、确立原住民特权地位、禁止华文报刊和教育、限制和禁止华人从事重要工商行业等等,乃至驱赶华侨华人出境。这些排华措施固然对当地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利,但都重创了当地华人社会,甚至造成华人的灭顶之灾。

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尼华人所受的劫难最多。所有找得到的排华理由,都被印尼排华势力所应用。二战甫结束,印尼极端民族主义者就发动大小 10 多次的排华暴动,华人死伤较多的有 1946 年的万隆暴动、文登(Tangarang)暴动,1947 年的巨港(Balembang)暴动。印尼独立后,苏加诺政府以“民族化”为借口,于 1952 年至 1959 年颁布各种法规,在经济领域实行全面排斥华侨的政策,对华侨经营的传统经济行业(如进出口行业、零售业等)严加限制和排斥。尤其是 1959 年发布的 10 号法令,禁止华人在县市以下地区经营零售业,导致 30 多万乡村华人零售商倾家荡产,流离失所。1957 年,全印尼有 1 669 间华校,45 万学生,到 1960 年,72% 华校被迫停办。[2](P15) 1960 年,华人商店禁用华文招牌,1965 年,禁止所有华文报刊出版。1965 年印尼爆发“9.13 政变”,极端民族主义政客以反共名义对华人大开杀戒,近 40 万华人被屠杀。[3](P46) 苏哈托政府上台后,关闭所有印尼华校,于 1967 年颁布《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对华人实行全面的强迫同化政策。1994 年棉兰发生排华暴乱。1998 年 5 月,华人再次充当印尼社会矛盾激化的替罪羊,数千家华人商店被抢劫,大批华人妇女被暴徒强奸,数以十万计的华人被迫逃离印尼。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菲律宾政府在对华侨采取压制和排斥的同时,一直严厉限制华侨入籍。1945 - 1965 年间,菲律宾政府以立法手段对华侨推行“菲化”政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限制和排斥华侨企业和资本。对来自中国的移民限制尤其严厉,1949 年准许中国移民入境人数减少 90%,而至 1950 年完全禁止中国移民入境,对申请入籍的华侨采取苛刻条件,用高昂费用、繁琐手续、拖延时日的办法加以限制。菲律宾政府限制华侨归化,是担心华侨成为菲律宾公民后,享有与土著菲律宾人同等的投资、经商、就业的权利,不再受菲化法律的限制,增强同土著菲律宾人在经济领域和职业上的竞争力。

1942 年,泰国政府就曾颁布过针对华侨的“职业限制法”,规定多由华侨从事的 27 种职业今后只许泰人从事。尤其是 1947 年以后上台的銮披汶政府,对华侨发动了所谓的“经济总攻势”,通过各种立法限制华侨的经济活动,在 1949 - 1956 年先后颁布第一、二、三号“职业保留法令”、“防止过度牟利条例”和“统制部分商品出口条例”,给华侨就业、经商、出口贸易造成很大困难。

在 1954 年至 1975 年期间,南越政权先后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强迫华侨归化运动。南越政权以强迫同化为目的,在 1955、1956、1957 年三次修改国籍法,强迫华侨放弃中国国籍而加入越南籍。1975 年越南南北方统一以后,河内政权开始逐步有规划地推行排华政策。河内政权在南越实行的“经济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虽然名义上是针对“资产阶级”,但实际上受打击的主要是华人,南越华人数百年经济基业顷刻化为乌有。1978 年以后,越南公开大规模排华和驱赶华侨华人出境。1979 年 2 月,中越战争爆发,越南更是变本加厉地公开驱赶华侨华人。到 80 年代初,越南当局就制造了 100 多万难民,而其中 50% 以上是华人。在这一过程中,越南当局掠夺了华人约 30 亿美元的财产,数十万人葬身大海。1978 年越南华侨华人人数约 180 万人,经过这次驱赶,留在越南的华人已不足 100 万人。[4](P45)

老挝政府长期受越南影响,其对华侨华人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效仿越南政府。1976

年,老挝政府实行对私人企业改造的政策,主要从事工商业的华人大量外逃,主要前往泰国。至1980年,老挝华侨华人仅剩1万人左右。

1956年,柬埔寨政府颁布的新移民法第26条规定了禁止外侨从事的18种职业。1957年对外侨汇款额规定为月收入的30%,1958年对外侨不动产作出了不能超过99年的规定,并下令取消华人会馆。但这些规定的实施比较平和,寓引导于管制之中,对华侨冲击不大,主要目的是引导华侨入籍。1970年,柬首相朗诺发动推翻西哈努克国王的政变,华人被当作西哈努克和越共的支持者而受迫害。1976年,红色高棉政权取缔私人工商业,将城市居民驱赶到乡村,废除货币的流通和使用,华侨华人被逐出市镇,其经济基础被连根拔除。1979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并随即推行排华政策,11年间离柬华侨华人有10余万人。

马来亚(1964年以后的马来西亚)独立以后,“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是历届马来人主导的政府的施政理念。马来西亚是唯一在宪法上规定马来人政治特权的东南亚国家,占全国人口28%的华人群只能做政治上的二等公民。1969年的“5.13族群冲突事件”导致143名华人死亡,多名华人政党领袖被捕,而马来人仅25名死亡。[5](P106)马来人给奋起争取族群政治平等的华人当头一棒,使其再也不敢挑战马来人的政治特权。1971年以后,马来西亚政府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新经济政策,以法令形式强行以牺牲华人企业为代价扶植马来人企业。

## 二、战后东南亚排华的借口和原因分析

华人定居于东南亚已达数百年,通过与土著通婚、转变生活习俗乃至宗教信仰,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当地社会,形成讲当地语言的庞大的土生华人群体。到20世纪40年代,在东南亚出生的华人已占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6](P23)在东南亚华人最为集中的爪哇,土生华人已占70%。[7](P140)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移民基本上被禁止进入东南亚。时至今日,东南亚华人本地出生者已占90%以上。尽管东南亚华族在血缘、语言和习俗已经日益趋同于当地土著,但仍不断遭受排华之苦。当地土著族群和政府排斥东南亚华人的借口和原因主要有:

1. 华人与当地土著民的经济差距。华人和当地土著经济地位的差异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排华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华人数百年来大多从事贸易,在商品流通领域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并利用其流通领域的优势地位发展金融业和制造业。有些专家甚至认为海外华人主导了东南亚的经济:华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80%的企业资产;控制了泰国90%的制造业和50%的服务业;菲律宾1000家大型企业中超过1/3由华人掌握;华人控制马来西亚60%的资本市场。[8](P4)这些论述过分夸大了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给当地国造成了华人控制东南亚经济的不实印象。就整体而言,东南亚华人的私人资本高于当地土著是不争之实。根据日本出版的《东南亚要览》1972年的资料,即使以华人人口比例最小的菲律宾华人而言,华人在菲律宾

---

关于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对华人的影响,参见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80页。

如印尼的“伯拉那罕”(Peranakan)、新马地区的“峇峇”(Baba)、菲律宾的“密斯提佐”(Chinese Mestizo)和泰国的洛真(Luck Chin)。关于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问题,参见吴凤斌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第6章《逐渐融合于当地民族的东南亚华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商业中的份额为 40 % ,金融业占 30 % 。[9](P201) 1970 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实行扶植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新经济政策”,从而使马来西亚华人和土著居民的经济地位在东南亚国家中差距最小。但是,直到 1995 年,马来西亚华人家庭平均收入仍高于马来人家庭 1 倍以上。1996 年东南亚五国上市企业中的前 30 位,如果以资本所有类型来区分,则是政府资本 10 家、原住民资本 7 家、华人资本 11 家、外国资本 2 家,华人资本企业数占 36.7 % 的比例。如果从市值总额来计算,政府资本占 51.7 % ,原住民资本占 11.2 % ,华人资本占 28.3 % ,外国资本占 4.5 % 。[10](P347 - 348)

扶持土著民在经济领域的弱势地位,一直是东南亚各国政府在经济上压制华人的最佳借口。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国政府相继颁布种种以牺牲华人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扶植土著民的经济法规,甚至采取直接剥夺华人资产的极端措施。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越南与柬埔寨当局对华人企业的全面剥夺,其实也是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铲除华人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同时,华人和当地土著的经济差距也使主张排华的政治势力较易煽动普遍贫苦的土著民对“富裕的华人”的对抗情绪。部分富裕华商的奢侈生活方式也加大了土著民对华人的反感心理,使当局排华措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一些富裕华人的婚丧娱乐活动过分奢侈。看过马尼拉和雅加达华人义山(公墓)的人,无不震撼于豪华的华人公墓和周边土著民潦倒的棚户区的强烈对比。[11](P112 - 113)一旦社会冲突激化,这种反感心理就激化为仇恨情绪,袭击华人、抢劫华人商店就成为东南亚排华暴乱的普遍行为,如马来西亚 1969 年的“5.13 种族冲突”和 1998 年印尼排华暴乱。王赓武教授在 1974 年曾指出,“华人和本地人民之间经济差距仍然是使今天双方关系遭到阻挠和隐藏冲突的主要根源”,“在双方关系很紧张的那些地方,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城市,种族差异的因素只是在经济差异使华人更加惹人注目的时候才产生作用”。[12](P205)诚然,华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主要在于勤奋、敬业和善于经商,经济原因也并非总是东南亚各种排华活动的主因,但只要华人整体上与土著民的贫富相差甚大,这种经济阶层差距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就极易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种族冲突。

2. 宗教文化差异。在东南亚不同国家,华人与当地土著的宗教文化差异程度不尽相同。大体而言,在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佛教国家,华人与当地土著宗教和习俗相近,较易融合,甚少在族群层面上冲突,排华理由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在伊斯兰教居强势地位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以宗教文化为标识的不同族群冲突较为激烈,极端穆斯林将华人视为“非我族类”而加以排斥,政府也试图强行同化华人。马来亚大学东亚学系主任何国忠教授指出,伊斯兰教是马来人的共同宗教信仰,大部分人是按宗教来划分马来人和华人的区别。“一般华人的观点,回教和中华文化格格不入,例如,回教教义规定信徒不许吃猪肉,而猪肉却是华人重要食物。”[13](P48)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主张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在

---

华人家庭收入为 1 974 林吉特,马来人为 923 林吉特。参见[马来西亚]林水椽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1998 年版,第 2 册,第 329 页。

如菲律宾 1954 年的《零售商菲化律》、1960 年的《米黍业菲化律》;印尼 1954 年的《碾米企业条例》、1959 年禁止华人在县市以下地区经营零售业;1971 年以来马来西亚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等。

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越南政府以“社会主义改造”名义,没收南越华人资产;民主柬埔寨政府以“消灭资产阶级”名义将居住在城市的华人全部驱赶到乡下,财产没收。

伊斯兰世界影响力急遽增长,东南亚穆斯林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推行更多的伊斯兰化政策,引发了华人的对抗情绪。马来西亚最大的反对党回教党提出建立回教国的主张,更激起华人的恐慌。2001年9月,马来西亚华人反对党行动党因此退出和回教党的结盟。

3. 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试图孤立中国,拉拢东南亚国家,构建反中国包围圈。西方国家利用其是东南亚前殖民宗主国的影响,煽动东南亚土著政府和民众怀疑华人对当地国家的效忠,诬蔑东南亚华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1954年印度尼西亚总理亚利访问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就中国政府允许海外代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表示担忧华人对中国的继续效忠,请尼赫鲁总理访问北京时与周总理讨论华侨问题。[14](P45)尼赫鲁对周恩来声明,华侨问题虽然与印度无直接关系,但印度极了解若干东南亚国家对此问题所引起的焦虑。据外电报道,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时,曾对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国具有与印度同样的看法,即居住在海外的侨民必须成为居留国国民。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重申鼓励东南亚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和效忠当地国家,但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仍成为排华的借口。1965年印尼发生大规模屠杀华人事件,其主要借口是怀疑华人对印尼政府的忠诚,诬蔑华人作为中国的“第五纵队”试图颠覆印尼政府。[15](P121)1974年,当马来西亚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担心中国通过大使馆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对国家的效忠,成为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16](P198)在双方的外交公报中,特别强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和要求马来西亚华侨要遵守当地法律和尊重当地习俗。新加坡南洋大学当时是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但新加坡某些教育决策者认为,南洋大学的华文教育会培养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这种看法是导致南洋大学被合并的原因之一。[17](P188)即使是华人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也担心其邻国将其视为“第三个中国”,刻意保持与中国的距离。李光耀多次申明,只有所有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后才考虑中国新加坡的建交问题。同时强调,中国不能无视新加坡政府而只通过向新加坡华人施加压力来迫使新加坡政府改变立场。[18](470-471)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东南亚的近邻,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一些东南亚华人到中国投资,使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怀疑这些华人的认同和政治效忠,甚至认为有些东南亚华人仍然“爱他们的祖国”。[19](P16-17)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不断改善,对中国影响东南亚华人的政治认同的担心在东南亚国家中有所减少。但基于地缘政治的理由,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潜在的对邻国华族的影响力,将长期存在于东南亚土著主导的政府和民众中。

4. 东南亚共产党问题。如所周知,除印度支那以外,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成员有不少是华人。尤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很多坚决抗日的华人聚集在共产党旗下,成为各地抗日武装的主力。马来亚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初期,曾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派别之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同情共产党的左翼势力相当强大。1946年大选中,以菲律宾共产党为核心的民主同盟获得议会6席,但被当选的反共总统宣布当选无效。印尼共产党在战后初期也颇为活跃,1955年印尼大选,共产党成为议会的第四大党。冷战时期,多数东南亚国家政府加入西方的反共行列,对当地共产党严加镇压。尽管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华人只是东南亚华人的少数,但反共的矛头经常指向整个华人族群。又由于战后初期东南亚当政者的反共立场和担心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交织在一起,导致东南亚华人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处境艰难。泰国、南越、菲律宾等国在战后初期,敌视新中国政府,这些国家的华人常被当局以“反共”为由加以迫害。菲议

会主席铁松曾妄称在菲华侨 90 % 是潜伏的共产分子。南越法国殖民当局常以“同情越盟”的嫌疑向华侨开刀。〔20〕1951 年,泰国政府甚至准备将“犯共党宣传活动、违反泰国基本政策而致危害国家安全之左倾亲共分子”递解台湾。〔21〕更有甚者,以反共名义行排华之实,常是东南亚政客的惯用伎俩。马来西亚政府官方对 1969 年“5.13 族群冲突”的指责中,包括认为华人肇事者与马共阴谋与华人私会党作乱有关。〔5〕(P117)新加坡当局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压制华文教育,认为华文教育本身促进新马华人对中国产生认同。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南亚的日益式微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改善,共产党问题已经越来越少被用来作为排华的借口。

战后东南亚排华事件层出不穷,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排华原因也各不相同。大抵而言,经济地位的差距一直是排华的主要原因。战后初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华人与东南亚共产党的瓜葛和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紧张,也常成为当地政要和民众排华的主要借口。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族群冲突主要发生在伊斯兰教主导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但即使在这两个国家,也未发生直接因为宗教文化对立引发的族群冲突。

### 三、华人和当地土著族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的排华活动有所减少,华人的处境逐步改善。

首先,华人和土著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先后修改了对华人经济的政策,采取相对宽容的措施,利用华人经济力量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 70 - 90 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土著民的经济地位获得显著提升。到 90 年代,原本极少从事工商业的土著民及其主导的政府,均在其国家的多数主要经济领域居优势地位。虽然土著民之间的贫富悬殊巨大,但就整体经济份额而言,华人主导的经济份额已退居次要地位。经济地位提升后的土著民自信心增强,对华人态度也逐渐宽容。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 1991 年提出的马来西亚 2020 年宏愿中,表明希望出现一个发达、公平、完全马来西亚族的马来西亚,改变了以前追求同化华人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其次,中国因素已不再成为与华人相关的“原罪”。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和实行国家关系正常化。60 年代以后,东南亚共产党活动已成低潮,不再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70 年代末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政治经济关系在互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与东南亚华人关系的担心也大为减少。1981 年,中国领导人访问马来西亚,重申中国不干涉东盟国家内政的政策。到 90 年代,甚至东南亚华人到中国投资,也基本上被各国政府视为有利于中国和东南亚双边经贸往来的举措。

第三,东南亚族群之间的宗教文化冲突有所减少。鉴于族群和谐对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表示了对华人的善意。即使在穆斯林主导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当政者也多次表示容忍华人文化和宗教存在的合理性。鉴于 1998 年排华暴乱对印尼社会经济的损害,印尼政府逐渐解除对华人的各种禁令。印尼总统瓦希德还于 2000 年 2 月 18 日宣布,正式承认孔教(儒教)为印尼合法宗教。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马来西亚主政者不断提

---

关于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经济份额比较,参见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8 - 210 页。

倡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1995年马来亚大学举办回儒对话研讨会,曾是伊斯兰教激进分子的副首相安华莅临会议并致开幕词。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政策日渐宽容,尤其在华文教育和宗教用地方面,部分满足了华人的诉求。[22](P274-275)

90年代以来,随着族群冲突的和缓,东南亚华人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环境日渐宽松,华人政治地位有所提升。虽然印尼1998年暴动对华人造成重大损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印尼华人社会地位的全面改善。大体而言,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华人华裔政治地位已和东南亚原住民相当,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地位仍有希望提升,印尼、印度支那、缅甸华人的处境日益改善。

1996年底,马哈蒂尔总理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我以前的观念是人民应该百分之百马来化才能成为马来西亚人,我们现在接受这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我们不想使所有华人改信回教,我们告诉我们的回教同胞,不应该强迫别人改信回教。”[23]1997年新加坡大选,以华人为主导的新加坡民主行动党取得全胜以后,吴作栋总理指出:“我们不是华人国家,我们也绝不允许华人沙文主义把我们变成华人国家。”[24]李光耀则强调,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种宗教和多种语文的国家,是新加坡继续生存的保证。[25]

以上代表华族和土著民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理念和宣示大概可以说明,在消融各种经济、意识形态和外部矛盾过程中,不同宗教文化的族群可能在东南亚和睦相处。就东南亚排华现象而言,文化差异并非总是华族与土著民族冲突的根源,甚至经常不是主要原因。只要东南亚各族群共同认可建立多元种族文化的国家,宗教文化的冲突就会减少。对华人而言,他们应更关心当地社会经济、族群关系和原住民的利益。只有东南亚各族群均衡发展,尤其是经济地位差距明显减少,华人社会权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由于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日益密切,东南亚族群经济差距日益缩小、各国领导层日益认可族群平等的重要性,我们对东南亚族群关系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看法。

## 结束语

二战以后,土著民主导的各国政府先后实施程度不同的排华政策,东南亚各地相继发生各种排华事件。引发排华的最主要原因,是华人与土著民的经济地位差距,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对族群关系发生重大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引发族群冲突的因素日益消融,华族与当地土著社会的关系逐渐改善。90年代以来,东南亚族群关系呈基本上和睦发展的趋势。

## 参考书目

- [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2]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
- [3] NAWAZ B. MODY. *Indonesia Under Suharto*[M]. Sterling, New Delhi, 1987.
- [4] 刘笑盈,于向东.战后越南华人四十年历史之变迁[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1).
- [5] 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M].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
- [6] 华侨人口参考资料[Z].北京:华侨问题研究会编,1956.
- [7] 傅无闷.南洋年鉴:癸[Z].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51.

- [8] JOHN MICKETHNAIT. A Survey of Business in Asia[J]. *Economist*, 1996, March, 9th.
- [9] 李国卿. 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M]. 郭梁, 金永勋译. 香港: 香港社科出版社, 2000.
- [10]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M]. 广州: 广东高教出版社, 2001.
- [11] 戴国辉.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 下册[M]. 东京: 亚洲经济研究所, 1974.
- [12] 王赓武. 东南亚与华人[M]. 姚楠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
- [13] 何国忠. 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马来西亚华人”语义辨析[A]. 李元谨. 新马华人: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C].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2002.
- [14] DONALD E. WILLMOTT. *The Nation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1900 - 1958*[M]. New York, 1961.
- [15] F. B. WEINSTEIN.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ilemma of Dependence: From Sukarno to Soeharto* [M]. Cornell University, New York, 1976.
- [16] 陈鸿瑜. 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外交政策[M]. 台北: 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2.
- [17] 古鸿廷. 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 马来亚篇[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94.
- [18] 张锡镇. 当代东南亚政治[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19]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M].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97.
- [20] 费振东. 海外华侨的处境[N]. 厦门日报, 1950 - 10 - 15.
- [21] 暹华侨亲共左倾分子当局将遣配台府[N]. 南洋商报, 1951 - 09 - 22.
- [22] 廖小建. 世纪之交马来西亚[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23] 李万千. 华文教育问题与前景[N]. 南洋商报, 1997 - 12 - 27.
- [24] 丹尼尔. 在一个华人选区里坚持多元种族主义久[N].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 1997 - 01 - 08.
- [25] 杜艳嫦. 甘冒风险批判邓亮洪是为了杜绝极端主义滋长[N].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 1996 - 12 - 31.

[责任编辑: 陈双燕]

##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 Native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east Asia

ZHUANG Guo-tu

**Abstract :** After the World War II many anti-Chinese ethnic clashes occurred in Southeast Asia. The main reason is because the ethnic Chinese occupied a much higher economic position than the native inhabitants, and kept a different culture from the natives. The ethnic Chinese became the victims of the governmental policies against China and communism. Since 1980s the elements causing clashes between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 natives have gradually come to dissapeare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 nativ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harmonious than before.

**Key words :** the Southeast Asia, the ethnic Chinese, anti-Chinese